

■经典重读

家庭的起源及其对中国史前考古的启示——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张梦彤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通过整理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以及结合自身思考撰写而成的一本专门著作。在该书中，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和阐述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作用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的客观规律。该书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并用理论武装工人阶级，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恩格斯就史前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对人类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关于家庭形式、社会分化的内容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者广泛使用。笔者通过阅读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史观中家庭的起源和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有所思考，遂撰文分享，以供讨论。

内容简介

该书共九章，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讲述文明时代之前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即史前时期，探讨古代社会的概况。第二部分即第二章“家庭”，主要探讨家庭的四种形式——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揭示家庭各自形式的演变及演变的关键与基础。第三部分由第三章至第八章构成，结合易洛魁人、希腊人、雅典人、罗马人、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等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专门探讨氏族制度的解体、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揭示了私有制在氏族社会的瓦解及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即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作为全书的总结，探讨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国家的本质及其特征，分析了文明社会的实质，对社会转变时期的经济条件及其重要作用做了深刻分析，论证了经济条件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该研究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其适用性。

通过对上述四大部分的叙述，恩格斯认为文明的进程、社会组织形式的演进都受制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简单来讲，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逻辑思想贯穿全书，成为作者论述的关键。

何为家庭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欧洲学者普遍认为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 forms 形式，同时还把父权制等同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对于家庭史的讨论与研究尚处于摩西五经的影响下，缺乏对于史前时期家庭形式的认识。

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对于家庭的起源、家庭形式的多样性、血缘制度等方面的讨论才逐渐开始。在此阶段，巴霍芬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由群婚向个体婚制过渡的形态，人类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并认为两性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是由于宗教因素而非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引起的，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在认识到世界各地婚姻形式的多样性、世系关系与亲属关系的多样联系之后，摩尔根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将人类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划分成三种：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又（恩格斯概括为根据生活资料生产水平的不同）将每个时代划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他确信现代易洛魁印第安人社会的亲属制度是美国一切土著社会的共有制度，且这种制度在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民族中同样存在。并从亲属制度出发试图复原当时与之相应的社会家庭形式，如此，母权制氏族是父权制氏族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被重新确认，意义非凡。

对于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了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认为，家庭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过程，必然要受到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

家庭是以婚姻作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其中包含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当一种家庭形式确立起来，就会形成相应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而亲属制度则是对这种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反映。恩格斯认为原始的家庭形式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而这种“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恰是原始状态下的人类所需要的。此外，“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这样一种例外形式”，这种形式“更是直接一切忌妒的感情相矛盾”，因此也是动物界所没有的。为了更加明确人类复杂的家庭形式的形成逻辑，恩格斯认为还需要往前“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使我们追溯到同一个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宜的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在最初的原始状态下，任何后世的禁忌，“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尚未出现，而正是这种生存状态才使人类能够作为完整的类存续下来。

对于家庭的形式，按照摩尔根的研究，大概有血缘家庭（参考波利尼西亚夏威夷血缘亲属制度，所有兄弟姐妹的子女互为夫妻）、普那路亚家庭（较上一阶段来说禁止父母与子女、兄弟姊妹之间以及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结婚，由此，氏族建立，且为母系氏族）、对偶制家庭（群婚制度被弃，一切亲属之间禁止结婚，一夫一妻制形成，对偶制家庭形成，子女仍属母系，可参考易洛魁人部落）、专偶制家庭（一夫一妻、父系社会）等。

群婚制度下的家庭形式无法确定的就是家庭内财产的继承问题。这是该制度的根本问题。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多，妇女越来越承受不了多夫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摆脱这种状况只有通过确定与某个男子的亲密关系的方式实现。在社会的经济条件和妇女的共同努力下，群婚时代最终走向终结，对偶制及专偶制家庭才可能出现。

对偶制家庭形成之初，人类社会坚持着以往的共产制家户经济，几个家庭住在一座房屋中，女性在家庭内部进行统治，享有高度的尊敬，丈夫的家庭责任是获得食物和劳动工具，但此时，对于子女来说，父亲的身份得以确立，这是与以往家庭非常不同的一点，也为之后母系氏族社会的崩溃埋下伏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技术的进步，家畜饲养逐渐发展，剩余财富开始出现，财产开始由氏族公有转向家庭私有，而作为食物来源和财富代表的家畜为丈夫所有，财富使得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使得财产的保有方式发生变化，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被废除，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于是丈夫的子女得以继承其财产，小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其后，母权制家庭经过家长制家庭公社过渡到个体家庭，女性地位的下降直至完全沦为男性的所有物之后，专偶制家庭产生。

恩格斯认为，专偶制家庭是一种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二个家庭形式。由此可以看出，专偶制家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看，以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为前提，财产的私有化及其在父子间延续是其产生的根本动力。同时，它也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个体婚制、奴隶制和私有制同时存在，社会开始分工，随即发生了文明起源的一系列宏大的故事。

给考古学家的启示与反思

该书中关于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从世界各地的民族学调查和历史文献、神话与史诗着手，颠覆了摩西五经的家庭模式传统认知，又是对研究者所持有的现代伦理观的一次冲击，意义深远。

目前，中国史前考古学家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学者普遍认为，其研究的古代社会群体大多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及两者过渡阶段，家庭模式很可能就是对偶制或专偶制。于是，对于遗迹中发现的房址、墓葬的讨论分析大多基于此而展开，如现在学界普遍将距今6000年的半坡聚落描述为一个处于母系社会阶段的村落，将发现的单个小房子描述为个体家庭，房屋群被认为是一个氏族的聚居地等。

然而通过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调查资料的积累，尤其是全球性的综合研究可以看到，即使处于相似的经济水平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生活模式还是存在差异的。一座房址里住的究竟不是一个包括父母、孩子的核心家庭？一座合葬墓中多个墓主是否是亲属关系？这些还需要结合更多研究手段（如DNA技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时需要注意，在研究某一地区的史前社会的时候，类比其他地区的现代民族学资料也存在局限性，该书中用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来解释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相关内容，这样的论证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默认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动力机制都一致，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社会的普遍性。

此外，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选择和应用也需谨慎考虑，荷马史诗、希腊神话等资料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并不一定是真实历史的再现，同理其他国家的历史文献材料，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可将其作为参考，但不应过于依赖。

通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的撰写，恩格斯系统研究和阐述原始社会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恩格斯认为，将唯物史观的理论应用于原始社会史研究，揭示原始社会的本质和规律，阐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是直接关系到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的重大课题。而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考古学的研究，该书中关于人类社会家庭形式的理论思想已被中国学者广泛接纳，并应用于对人类史前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阐释。但人类社会终究是更加多样的，一个地区、某种文化背景的民族学材料并不具有百分之百的普适性，因此，作为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始终要保持对理论的谨慎态度与批判思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读“船说”解“传说”——评《“南海I号”船说》

崔勇

2024年初，《“南海I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出版，这是一本全景式回顾南宋沉船“南海I号”发现、打捞、发掘、保护以及讨论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作。该书作者魏峻是我以前的同事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引进的第一位博士，和我的水下考古生涯有近十年的交集。2007年时，我在广东各主持一个水下考古项目，我负责粤东的“南澳I号”明代沉船调查，他则负责粤西的“南海I号”整体打捞。后来，魏峻博士在2009和2011年两次主持“南海I号”试掘，并是2013年“南海I号”正式发掘时的两位项目主持之一。由于参加“南海I号”的工作时间长，他对于南海I号及相关工作细节很有发言权。

有关“南海I号”的图书和文章我看过很多，然而这本《“南海I号”船说》，在看第一眼时就深深吸引了我。当然，让我一口气读完该书的不是“南海I号”考古的种种细节，真正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新颖呈现方式，既详述了“南海I号”考古的微观细节，也观照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主题。作者是大学考古教授和南海I号考古的参与者，这就让该书内容的学术性和真实性有了切实保障。同时，《“南海I号”船说》

采用了公众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和语言来讲述学术问题，使其兼具了学术研究和科普作品的优势。由发现篇、打捞篇、考古篇、货物篇、海贸篇及尾声等篇章的组合，既让该书紧扣了“南海I号”考古和研究的主线，又有机串联起了中国水下考古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暗线。理顺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源、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各个阶段特征，也解读了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造船、制度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可以说，作者通过“南海I号”构建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百科的搜索引擎，把沉船作为引擎的树状结构主干，围绕主干的内容枝繁叶茂，将考古、海丝的知识点巧妙传达给读者，是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对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渐成热门“显学”，而其中“南海I号”因其独特且真实的内涵成为热门中的热门，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目前，研究“南海I号”及相关课题的团队和个人很多，但多限于历史或考古学科的内部，有时各自为政，成果也多在考古报告、专业期刊上发表，服

《对话初心》：与百年前共产主义先驱的初心对话

刘婧雨

《对话初心——图说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一书是重庆史研究会为庆祝建党百年而立项的研究项目。该著作以体量丰富的文物、影像和文字史料，图文并茂地回顾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巴渝地区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全面具象地还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革命历史文化图景。这是一部集重庆史学者长期研究成果于一体的学术专著，是今天的共产党人与百年前共产主义先驱者们的一次“对话初心”，更是重庆历史学者的献礼之作。

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分别为“屈辱开埠 追梦复兴”“觉醒巴渝 寻求真理”“播火擎旗 立党为民”“国共合作 统战先驱”“枪响泸顺 起义壮举”“前赴后继 热血丰碑”“浩气长存 星耀巴渝”，完整呈现了巴渝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发生、发展的历史面貌，同时侧面展现了这一时期重庆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全书共收录507张图片，不仅有来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市档案馆等机构的大量馆藏历史照片，以及相关主题创作雕塑和画作的图片，还包括从中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法国国家档案馆等搜集到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约》和中日《马关条约》等许多珍贵的文物照片。许多照片是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发布，也是对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相关历史影像的一次系统性收集、整理、研究和展示。

书中所述的历史时段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当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在中国北京、山东、上海、武汉、湖南、广州等地兴起时，在川渝地区，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组织，

多维度视野下的《襟带河汾：晋国博物馆陈列与精品》

石磊

近日，有幸收《襟带河汾：晋国博物馆陈列与精品》一书，此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古朴中蕴含着大气。惊喜之余，仔细研读。本书纲举目张，环环相扣，以晋国历史为线索，以晋侯墓地出土的诸多珍贵文物为载体，对晋国博物馆的历史和陈列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介绍，集历史性、区域性、知识性、趣味性、厚重性、文化性于一身，称得上是对先秦时期晋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现将笔者的一些观感列出，与众君分享。

从时空维度看：襟带河汾的文化内涵 山西简称“晋”，来源于西周时期的古晋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分邦建国，以藩屏周”，晋国即为西周早期的重要封国，始封君主为周武王之子姬虞。两周之际，晋国是周王室在黄河流域的重要封国，步入东周后，“春秋五霸”兴起，其中晋国执掌春秋霸权长达150多年。“襟带河汾”之所以成为晋国的历史地理代名词，原因在于晋国的始封地域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也就是在今天晋南翼城、曲沃、绛县一带，这一区域在历史上居深山，与戎狄为邻，是汾河下游谷地的重要封国，表里山河，拱卫京畿，藩屏王室，是周王室控制河汾一带不可或缺的地区。西周王朝施行“两都制”，首都位于镐京，陪都位于雒邑，而晋国的位置，刚好位于连接镐京与雒邑的中间环节，因此晋侯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保持镐京与雒邑的战略通道之安全。同时从血缘的角度考虑，襟带一词用在晋国身上，也非常贴切。周初的国姓诸侯，主要是“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而叔虞作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在周初众多姬姓封国中与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也称得上周王室的襟带。从西周末年的“文侯勤王”，到东周时期晋国高平“尊王攘夷”的旗帜屡屡帮助周天子维护摇摇欲坠的王纲统治，可以说晋国在事实上成为周王室的衣襟与腰带，本书的名字中“襟带河汾”一说，即有这方面的内涵考量。

从文物维度看：雅俗共赏的瑰宝 晋国博物馆馆藏及展示的文物，主要以晋侯墓地为出土的青铜器、玉器 and 陶器为主，辅以其他出土器物，基本陈列“唐风晋韵——晋国历史文化及晋侯墓地遗址展”以晋文化为主线，设置了晋国历史文化展、曲村一天马遗址发掘史展、晋侯墓地遗址展等三个展厅，这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有体现。

第二部分“栴风沐雨览地书，灯火阑珊著华章”一节，主要记录了曲村一天马遗址发掘历程，这个展厅用实物、图片和场景复原等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三代考古人博览群书、探寻晋踪的经过和考古发掘工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桥山溢水，泱泱陵寝”一节，指的则是晋侯墓地遗址陈列，属于晋国博物馆展览的核心部分。室内重点展示了4组具有代表性的墓葬（晋侯燮父及其夫人墓、晋靖侯及其夫人墓、晋献侯及其夫人墓、晋穆侯及其夫人墓）和3座陪祀车马坑（晋献侯车马坑被发掘，其余两座未发掘），在保持遗址原状的前提下进行了科学的修复、加固，并按照发掘出土时的棺椁格局、随葬品摆放形式，营造出了一墓一景，各具特色的参观效果。

第三部分“晋国博物馆精品文物”，既包括晋侯夔鼎、竖棱纹圈足簋、凤鸟纹盘、凤鸟纹提梁卣、樊马盂、兔尊等青铜器，又包括玉石器中的玉串饰、玉组佩、玉璧、玉璜、玉琮等，还包括绳纹袋足鬲、尖底瓶、陶鸟盂、陶觚、陶大口尊、陶鼎等陶器。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通过科学发掘获得，多从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中出土，呈现出典型的两周之际的器物造型特点，亦具备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本书实际上是对晋侯墓地出土文物进行多重价值维度综合研究的产物。同时以图



务于学术的小众圈子。“《南海I号》船说》的作者是专业的考古学者，担任省级博物馆馆长的经历又让他愿意把艰深的学术成果提炼出来惠及大众。这一点，我在与他合作策展“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大海道”等水下考古主题展览时就深有体会。这些展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口碑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获得过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推介精品奖、荣誉。由简至繁，其实由繁化简更

难，这需要换位思考，也需要从学术语言到科普话语的转换能力。要从受众角度去思考才能取得实效。应该说，作者和他的作品做到了。

俗话说“一鲸落，万物生”。“南海I号”沉船就像一个文化鲸落，它提供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养分”不断滋养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不同学科的发展。这本《“南海I号”船说》就是对南海I号这个“鲸落”的养分进行解构和消化的成功案例，让考古成果更完整、全面、系统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用“南海I号”的考古“船说”来释疑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说”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也体现了文博工作者的责任心与社会担当。（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海I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魏峻
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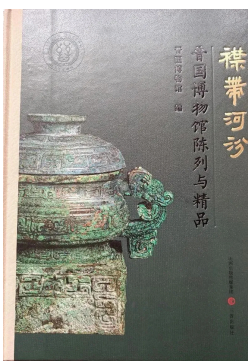


中共四川省委成立的历史进程，以及革命先烈浴血奋斗、英勇悲壮的光辉业绩进行了集中呈现。展览于2019年7月1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暨周周遗址故居正式开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扩大了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界与普通群众中的影响。这是对巴渝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当今党员、干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展示。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立项研究决定，以“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料展”为基础，同时收集整理了许多因展览篇幅限制而没有呈现的新内容，编纂著作《对话初心——图说巴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这是与百年前的先辈们对话，重温他们立下的初心使命，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重整行装再出发。这是面向共产党员、人民群众的红色文化、革命传统教育著作，是对巴渝地区早期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永久纪念，更是重庆史研究会的学术传承之作。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对话初心——图说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主编：周勇
著者：刘婧雨 颜毅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片配文字简介的画册为主要成果进行展示，可谓“雅俗共赏”。

从传播维度看：务实可行的保护利用 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晋大地的文化基因、文脉基础与精神家园。晋国博物馆作为晋南地区研究晋国史的重要基地，既是一座能追溯到晋国源头的博物馆，又是一座承载着文物与历史的文化殿堂，它浓缩了晋国六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了考古人筚路蓝缕的发掘历程，以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与展览配套的完整翔实的文字资料，也是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举措。李伯谦先生为此书撰写了序文，称赞此书“一本图录在手，开启了了解晋国、了解晋国考古、了解晋国早期都城曲村一天马遗址、了解晋文化的大门，可谓开卷有益”。

当然此书亦有部分内容值得商榷，比如本书第二部分“华夏故国三千载，风云春秋六百年”中的“昭昭小宗，代翼统疆”一节，对于“曲沃代翼”的介绍过于简略，同时对于此时的“曲沃”究竟是指闻喜，还是指今天的曲沃，未详细说明。而在“赫赫晋国，地震万邦”一节，主角描写的是晋文公重耳，但是在简介中写到重耳在践土会盟称霸之后，“其后迁都新田，九合诸侯”，是个失误，因为晋文公没有迁过都，迁都新田的是晋景公。但瑕不掩瑜，此书依旧是研究晋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单位：山西省翼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襟带河汾：晋国博物馆陈列与精品》
编者：晋国博物馆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月